

欧盟外国移民社会融合的多维度分析*

宋全成 甘月童

内容提要 欧盟及其成员国能否发挥外国移民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关键因素是能否成功地将外国移民融入欧盟国家主流社会。欧盟的外国移民在就业、收入、住房、教育和积极公民身份五大领域的社会融合取得了显著进步。移民的劳动参与率整体上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收入水平增速快于本国公民;外国移民生活在租住房屋中的状况得到显著改善;第三国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明显进步;外国移民获得10年以上的长期居留签证占外国人签证的93.8%。这凸显了欧盟的“欧洲2020年战略”和《第三国国民融合行动计划》实施的外国移民社会融合政策实践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关键词 欧盟国家 移民 难民 社会融合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欧洲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包括欧盟成员国移民和第三国移民在内的数以千万计的外国移民在欧盟境内工作和生活。2022年欧盟人口普查的 latest 数据显示,有3742万外国人居住在欧盟27个成员国(占欧盟总人口的8.4%),其中1372万是来自其他欧盟成员国的移民,2370万是来自非欧盟成员国的第三国移民(占欧盟总人口的5.3%)。^①一方面,外国移民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规模,促进了欧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来自不同地区、铭刻不同文化特征、没有实现社会融入的部分外国移民,又带来了社会隔离、社会反抗、恐怖主义与犯罪等社会问题。外国移民成功地融入欧盟主流社会是实现外来移民对欧盟发展的贡献最大化的关键。本文基于2018年欧盟统计局的移民社会融合统计最新数据^②,运用人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欧盟外国移民的基本特征,进一步从劳动力市场与就业、收入、住房、教育、积极公民身份等五个维度对欧盟国家的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研究。

一、欧盟移民社会融合的概念与分析维度

外国移民的构成受到许多因素(历史、地理、移民政策)的影响,移民社会融合情况受个人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移民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家庭状况、家庭成员数量、公民身份、出生国、居住时间等;社会经济因素包括教育、就业、收入、职业、原籍国的发展水平、语言、城市规模、靠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欧盟的难民危机、移民融入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7BMZ091)、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研究项目“当今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研究”(编号:2018-GMB-06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Eurostat, *Migration and Migrant Population Statistics*,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Migration_and_migrant_population_statistics, 2022.

^② 2019年3月英国正式脱离欧盟,而2018年英国尚未脱离欧盟,因此,欧盟2018年关于外国移民社会融合数据是包括英国在内的28个国家的数据。

近市中心等。^① 如果外国移民能够成功地融入所在国的主流社会,则会对所在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如果不能成功地融入社会,则会对国家财政、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构成挑战。

“社会融合的概念最早来自欧美发达国家,主要针对外国移民在本地工作和生活的适应问题,后来逐渐演变为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相互影响、同化的过程。”^②就移民社会融合的定义而言,黄旭等(2020)^③指出,全球化时代下,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合不仅是居住空间的邻近,也包括其与本地居民各种日常生活活动的空间共享,如社区工作、日常消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就欧盟移民社会融入情况而言,诸多学者对欧盟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入情况进行了研究。阿迪达(2014)^④、佛若坦(2014)^⑤、克里斯蒂安(2009)^⑥等分别对法国、德国、英国穆斯林移民的社会融合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社会融合政策的促进下,穆斯林移民在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就业、政治参与等方面依然面临着宗教背景与宗教文化价值观的歧视。汪丽娟(2018)^⑦、杨友孙(2015)^⑧等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此外,有学者就移民政策对于移民社会融合情况影响进行了研究,如杰克布森(2018)^⑨等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丹麦、挪威、瑞典)的外国移民在劳动力市场的融合状况进行了研究,其中丹麦在移民融合政策的改革中实施了非常严格的移民政策以促进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合,而研究结果表明这一举措对非西方移民的就业和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海布灵(2020)^⑩等对22个欧洲国家进行了研究,考察更严格的移民融合政策是否能够筛选出具有更大融合潜力的外国移民,从而促进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合。研究结果显示,移民政策确实影响社会融合的结果,但这些影响很小,仅限于特定的融合结果和来自特定地区的外国移民。

国际移民融合通常有三种经典理论:适应同化论、多元文化共存论与社会融合论。适应同化论主要广泛应用于美国,推崇的是一种普世价值,认为少数族裔应当去适应发达国家的主流文化。多元文化共存论是荷兰、英国等国广泛运用的移民融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外国移民与当地不同的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与适应,从而实现共存。社会融合论则更加强调外国移民与当地居民的相互作用,不仅考察外国移民的生活是如何被当地的居民、文化和制度所塑造的,也关注当地居民、文化和制度在国际移民社会融合的过程中如何被“反塑造”。^⑪正如艾利森所说: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合可以被定义为外国移民被包容进主流社会或各种社会领域的状态与过程,包含外国移民与所在国社会之间的互动和相互适应^⑫。

从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视角来看,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合大体可分为广义的社会融合与狭义的

① N. Carmon,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40, no. 4, 1981, pp. 149 - 163.

② 肖子华:《人口流动与社会融合:理论、指标与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前言。

③ 黄旭、刘怀宽、薛德升:《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移民社会融合研究综述与展望》,载《世界地理研究》,2020年第2期。

④ C. L. Adida, D. D. Laitin, M. A. Valfort, *Muslims in France: Identifying a Discriminatory Equilibrium*, Université Paris1 Panthéon-Sorbonne (Post-Print and Working Papers), 2014.

⑤ Naika Foroutan, *Identity and (Muslim) Integration in Germany*, Washington, D. C.: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13.

⑥ Christian Joppk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Paris), “Limits of Integration Policy: Britain and Her Muslims”, *Journal of Ethnic & Migration Studies*, vol. 35, no. 3, 2009, pp. 453 - 472.

⑦ 汪丽娟:《法国穆斯林移民社会融入问题研究》,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2期。

⑧ 杨友孙:《德国推动穆斯林社会融入政策考察》,载《学术界》,2015年第2期。

⑨ V. Jakobsen, T. Korpi, T. Lorentzen, “Im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Policy and Labour Market Attainment Among Immigrants to Scandinavia”,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vol. 35, 2018.

⑩ M. Helbling, S. Simon, S. D. Schmid, *Restricting Immigration to Foster Migrant Integr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across 22 European Countries*, EconStor Open Access Articles, 2020.

⑪ I. G. Ellen, “Race-based Neighborhood Projection: A Proposed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New Data on Racial Integration”, *Urban Studies*, 2000, vol. 37, no. 9, pp. 1513 - 1533.

⑫ Winfried Ellingsen, “Social Inte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Europe”, *Geografii Bergen*, University of Bergen, 2003, <http://bora.nhh.no/handle/2330/2036>.

社会融合。广义的外国移民社会融合是一个涉及外国移民的经济、文化、社会参与与政治等多领域、多维度的融合过程。而狭义的外国移民社会融合仅是指外国移民参与社区、城市或国家的相关决策、是否享受到社会保障等的融合过程。从欧盟 1999 年开始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外国移民社会融合政策来看,“社会融合”的含义不断丰富和发展,且社会融合的措施更加具体、全面,已覆盖就业、教育、住房、社会参与、社会保障和积极公民身份等诸多领域。基于此,本文选取了能够衡量外国移民社会融合重要维度的劳动力市场与就业、收入、住房、教育、积极公民身份五个维度,使用欧盟关于社会融合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和研究欧盟的外国移民社会融合的具体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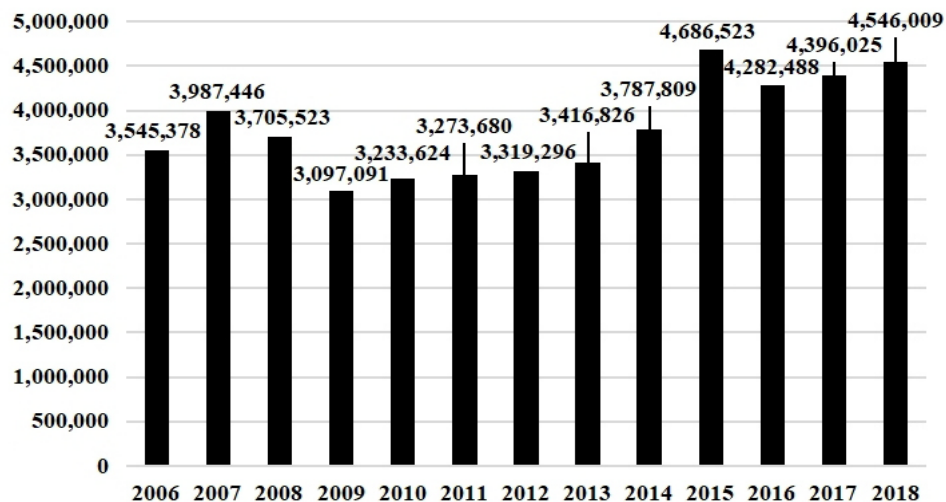
二、欧盟国家移民的基本概况及移民社会融合政策发展回顾

布里(1997)^①提出,外国移民研究有两个基本领域:移民政策和社会融合政策,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外国移民与社会融合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要研究外国移民社会融合的状况,首先要对欧盟外国移民的基本状况进行把握。依据推拉理论,外国移民受到迁出国的推动因素与迁入国的吸引因素的共同作用。从历史上看,欧盟国家经济的相对繁荣和政治稳定对外国移民的确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作用。^②

(一) 从移民规模上看,2018 年迁入欧盟国家的外国移民人数呈现回升趋势

人口的数量和规模是人口自然特征的重要内容。考察外国移民的数量和规模,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欧盟国家移民的总体状况,从而为移民融合政策的实施、修订和完善提供决策基础。

图 1 2006—2018 年迁入欧盟 28 国的移民人数^③ (单位:人/年)



2006—2018 年每年迁入欧盟国家外国移民人数的动态变化情况如图 1 所示,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 12 年中,外国移民流动的强度各不相同,整体上呈增长趋势。在 2006 年,大约 354.5 万人移民迁移到欧盟国家,2007 年增加到了 398.7 万人,达到了第一个峰值。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移入欧洲的移民数量逐渐减少,2010—2013 年呈缓慢增长的趋势。2014 年,外国移民人数增速再次加快,2015 年外国移民人数达到 468.7 万人,是同比增长最高的年份,与 2014 年相比增加了

^① R. Y. Bourhis, L. C. Moise, S. Perreault, (et al.), “Towards an 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32, no. 6, 1997, pp. 369 – 386.

^② 杨菊华、谢永飞:《人口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49 页。

^③ 欧盟统计局:http://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show.do?dataset=migr_imm1ctz&lang=en,检索时间:2020-10。

89.9万人,增长率高达23.7%,这与2015年发生难民危机,导致大量的难民涌入欧洲有关。2016年外国移民人数下降至428.2万人,这与2016年3月欧盟—土耳其难民协定的签署而导致的难民进入欧盟的数量减少紧密相关。而后在2017年和2018年呈缓慢回升的态势。2018年,共有454.6万外国移民进入欧盟国家,又有295.6万移民离开了欧盟国家。居住在欧盟国家的第三国移民人数为218.6万人,占迁入总人数的48.1%,居住在其他欧盟国家的欧盟成员国移民人数为128.7万人,占迁入总人数的28.3%。

(二)从移民的绝对数量来看,迁入移民总数前五位的欧盟国家是德国、西班牙、英国、法国和意大利

2018年,移民的迁入数与迁出数最多的国家都是德国,迁入德国的移民总数为89.4万人,迁出德国的外国移民人数为54万人。从德国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可知,在迁入德国的外国移民中,其他欧盟国家的外国移民是外国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从德国迁出的移民中,前往其他欧盟国家的移民占大多数,迁往第三国的移民不多;从总体来看,德国的净移民量并不大,这与我国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相符。^①西班牙的迁入外国移民数仅次于德国,达64.4万人,其次是英国(60.4万人)、法国(38.7万人)和意大利(33.2万人),这五个欧盟成员国中的非国民总数占居住在所有欧盟成员国中的非国民总数的62.9%。共有23个欧盟成员国移民的迁入数超过迁出数,但在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移民的迁出数超过了迁入数(见表1)。

表1 2018年欧盟28国移民人数与迁移率^② (单位:人)

国家	总人口	迁入人口	迁入率(%)	迁出人口	迁出率(%)	其他欧盟成员国 迁入人口	第三国 迁入人口
比利时	11398589	137860	12	88935	8	63924	54911
保加利亚	7050034	29559	4	33225	5	1038	12287
捷克	10610055	65910	6	26742	3	17837	43544
丹麦	5781190	64669	11	60381	10	24957	20125
德国	82792351	893886	11	540415	7	370375	370354
爱沙尼亚	1319133	17547	13	10476	8	4158	5460
爱尔兰	4830392	97712	20	53735	11	32311	32839
希腊	10741165	119489	11	103049	10	16726	70564
西班牙	46658447	643684	14	309526	7	145298	414292
法国	66918941	386911	6	341421	5	78560	176625
克罗地亚	4105493	26029	6	39515	10	2242	15157
意大利	60483973	332324	5	156960	3	57369	228117
塞浦路斯	864236	23442	27	15340	18	8330	10700

(见下页续表)

① 宋全成:《当代德国人口的社会学分析》,载《兰州学刊》,2016年第5期。

②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migr_imm1ctz/default/table?lang=en,检索时间:2020-10。

(接上页)

拉脱维亚	1934379	10909	6	15814	8	667	5858
立陶宛	2808901	28914	10	32206	11	771	11536
卢森堡	602005	24644	41	13985	23	16435	6882
匈牙利	9778371	82937	8	48178	5	11139	38160
马耳他	475701	26444	56	9342	20	11353	13512
荷兰	17181084	194306	11	109635	6	79443	66621
奥地利	8822267	105633	12	67212	8	65327	30553
波兰	37976687	214083	6	189794	5	19175	76410
葡萄牙	10291027	43170	4	31600	3	8092	14663
罗马尼亚	19530631	172578	9	231661	12	9193	21867
斯洛文尼亚	2066880	28455	14	13527	7	3381	20720
斯洛伐克	5443120	7253	1	3298	1	2226	643
芬兰	5513130	31106	6	19141	3	7037	15091
瑞典	10120242	132602	13	46981	5	28151	83836
英国	66273576	603953	9	344347	5	201959	325052

(三) 从移民的迁移率来看,人口流动性最大的是马耳他、卢森堡和塞浦路斯

迁移率是衡量移民的一个相对指标,常用千分数表示。2018年,马耳他的总迁移率最高,人口迁移率为76‰(每1000人中有76个移民),即人口的流动性最高,其次是卢森堡64‰和塞浦路斯45‰。以人口迁移率最高的马耳他为例,马耳他在二战时为盟军进行的战争提供各种国防军备,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然而,战后随着核能的发展与工业化的萎缩,马耳他面临着新的经济形势,数以万计的原有工作岗位已不复存在,造成众多失业者。政府虽然采取了立法的手段提供物质和临时救济来保障失业者的日常生活,但依然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效地解决大量失业问题,政府不得不采取有计划的鼓励移民外迁的活动。1962年11月,马耳他申请加入欧洲移民政府间委员会,移民、劳工和社会福利部移民司提供必要的移民外迁服务。^①此后,不断迁移成为马耳他国家的一项久盛不衰的文化传统。由此可见,移民的迁移率是与政府的鼓励移民外迁的政策密切相关。

欧盟今天的外国移民概况是欧盟历史上采取的一系列社会融合政策的具体产物。客观来看,欧盟的社会融合政策是应对外国移民带来的挑战、推动合法居住在欧盟成员国中的第三国移民的社会融合而提出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外国移民的社会隔离与社会冲突、外国移民参与恐怖主义等系列移民问题,在欧盟一体化的进程中,外国移民社会融合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欧洲移民融合政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9年的坦佩雷计划(Tampere Programme),这一计划包含了与难民在欧盟得到合法庇护相关的社会融合问题。2004年11月欧盟委员会通过的《移民融合政策共同基本原则》构成了欧盟移民融合政策合作的基础,该原则将社会融合定义为所有外国移民和欧盟成员国居民相互适应的双向的过程,涵盖了一体化进程

^① Zammit, H. A. Cachia, "Malta and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1, no. 3, 2010, pp. 178 - 182.

的主要方面,如就业、教育、获得机构支持、商品和服务以及进入整个社会的机会等。^① 2010 年欧盟进一步提出了“欧洲 2020 年战略”和“斯德哥尔摩方案”,说明欧盟充分认识到了外国移民在促进欧盟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巨大潜力,并将合法移民有效融入社会作为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以此促进对人的尊重和人权的发展。^② 针对第三国移民社会融入状况不佳的现实,2011 年 7 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促进第三国移民社会融合的议程,重点是采取行动增加外国移民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参与。这一新议程凸显了欧盟受益于外国移民所带来的发展潜力和多样性价值的同时所必须应对的挑战。^③

2016 年 6 月,欧盟委员会又通过了《第三国国民融合行动计划》,该计划为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合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政策框架,同时促进欧盟成员国移民政策的一体化。该计划实行的对象是欧盟所有第三国移民。社会融合的政策内容包括:第一,外国移民主动融入社区的准备、当地社区接纳外国移民的准备;第二,外国移民的教育,包括语言培训、儿童接受教育与照料、师资培训和公民教育等;第三,外国移民的就业和职业培训,促进外国移民尽快融入劳动力市场和外国移民企业家创业;第四,外国移民获得住房和医疗保健等基本公共服务;第五,外国移民积极社会参与和社会包容,包括采取行动支持外国移民与接受社会的交流,支持外国移民参与文化生活,打击歧视等。2020 年 12 月欧盟进一步发布了全面促进外国移民社会融入行动计划。根据这一行动计划,欧盟未来 7 年采取的重点措施主要涉及外国移民的教育和培训、就业和技能认定、健康服务、居住条件等领域。对此,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加里蒂斯·希纳斯表示,融入和包容性政策对外国新移民和欧洲当地社会都至关重要,这将有助于减少外国移民的社会隔离与社会冲突,增强欧盟的社会凝聚力,推动欧盟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

三、欧盟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合分析

成功地将外国移民融入主流社会是促进合法移民对于欧盟的发展贡献最大化的关键。外国移民社会融合的程度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与就业、收入、住房、教育和积极公民身份五个主要指标来衡量,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外国移民的就业,即劳动力市场的融合状况,因为外国移民正是通过这一渠道,积极融入了欧盟社会,对欧盟成员国做出了显著的贡献^④。

(一) 外国移民的劳动力市场与就业的社会融合状况及分析

第一,外国移民的劳动参与率缓慢增长。与本国公民相比,外国移民的失业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但其差距正呈现出缩小的趋势。

反映劳动力资源利用情况的统计指标有劳动参与率、失业率。劳动参与率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即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失业率是指失业人数占从事经济活动人口的百分比^⑤,就业率是指从业人员占劳动年龄人口比率。在欧盟许多成员国中,第三国外国移民与欧盟国民之间的就业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

就劳动参与率而言,自 2010 年以来,第三国外国移民的劳动参与率明显低于本国国民和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的劳动参与率。至 2016 年,这一差距呈先增加、后缩小的倒 U 型趋势。2010 年,

①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Union Council document*, 2004.

② European Union, *The Stockholm Programme: An Open and Secure Europe Serving and Protecting Citizens*, 2010.

③ Eurostat, *Migrant Integration-Background-Overview*,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migrant-integration/background>.

④ Adéla Zubíková,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in the EU_15: Success or Failure? Proceeding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Conferenc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ciences, 2019.

⑤ EU-Migrant Integration 2017,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7, p. 20.

第三国外国移民的劳动参与率与本国国民和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的劳动参与率相差 1.4 个百分点和 6.9 个百分点;到 2016 年,这一差距扩大到了 7.3 个百分点和 12.8 个百分点。随后缩小到了 6.5% 和 11.6%。2018 年,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的劳动参与率比本国国民的劳动参与率高 5.1 个百分点,这表明此类移民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更高。2018 年,第三国外国移民的劳动参与率达到 66.7%,而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劳动参与率达到 78.3%。^①

就整体失业率而言,2018 年,欧盟 28 国 15—64 岁年龄段的整体失业率达到 6.8%,与前一年相比下降了 0.8 个百分点。第三国外国移民的失业率为 16.4%,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的失业率为 8.5%,本国国民的失业率为 6.8%。由此可见,外国移民的失业率与本国公民相比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第三国移民的失业率远高于本国公民与其他欧盟国家移民的失业率,但其差距开始呈现出缩小的趋势。2010 年以来,差距最大的年份是 2013 年,第三国外国移民的失业率比本国公民失业率高 13.3 个百分点,后逐渐缩小至 2018 年的 9.6 个百分点。^②

青年是劳动力市场的中流砥柱和新鲜血液。在劳动力市场中,青年就业率是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指标。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欧洲,能否充分利用迁移而来的外国移民青年劳动力,是缓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解决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重要途径。就 15—29 岁的青年劳动者而言,2018 年,非欧盟国家出生的外国青年劳动者就业率(45.4%)低于其他欧盟国家出生的年轻人(59.0%)和本地出生的年轻人(49.8%)。就国别而言,这一比例在拉脱维亚,非欧盟出生的外国青年劳动者就业率最高,为 76.6%,其次是爱沙尼亚(73.8%)和马耳他(71.6%)。比利时、法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非欧盟国家年轻外国移民的就业率最低(均低于 40%),由此可见,非欧盟国家出生的外国青年劳动者就业率的国别差异之大。在 28 个欧盟成员国中,有 13 个欧盟成员国本地出生的年轻人的就业率高于非欧盟国家出生的外国青年劳动者,其中差异最大的是荷兰、瑞典、英国、芬兰和德国,出生于荷兰的青年劳动者就业率高于非欧盟国家出生的外国青年劳动者 16.9 个百分点。而在克罗地亚,非欧盟国家出生的外国青年劳动者就业率甚至比本地出生的青年劳动者就业率高 22.7 个百分点。在爱沙尼亚、捷克、希腊和葡萄牙,非欧盟国家出生的外国青年劳动者就业率比本地出生的青年劳动者就业率均高出 10 个百分点。^③

第二,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异依然存在,女性外国移民的劳动参与率普遍低于男性。

联合国、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以及以往的学术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中,都存在性别差异,总体来看,男性的劳动参与率远高于女性。从欧盟相关的数据来看,不论迁入欧盟的那一成员国,2018 年外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普遍低于男性,在 28 个欧盟成员国中,女性外国移民的劳动参与率比男性低 11 个百分点,女性外国移民的失业率比男性高 0.5 个百分点。这表明,在就业中性别平等尚未完全实现,而对于女性外国移民来说,这一点更加明显。

从欧盟成员国的国别来看,2018 年,在劳动参与率上的性别差异最大的国家是马耳他,女性外国移民的劳动参与率比男性外国移民低 21.0 个百分点,其次是意大利(相差 18.9 个百分点)和罗马尼亚(相差 18.6 个百分点)。性别差距最小的国家是立陶宛(相差 3.1 个百分点)、芬兰(相差 3.2 个百分点)和瑞典(相差 3.4 个百分点)。在失业率上,性别差异最大的国家是希腊,其女性外国移民的失业率比男性外国移民高 8.9 个百分点,其次是西班牙,其女性外国移民的失业率比男性外国移民高 3.3 个百分点,其他国家则差异不大(见表 2)。

① 欧盟统计局: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migr_imm1ctz/default/table?lang=en,检索时间:2020-10。

② 欧盟统计局: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lfsa_organ/default/table?lang=en,检索时间:2020-10。

③ 欧盟统计局: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lfsa_organ/default/table?lang=en,检索时间:2020-10。

表 2 2018 年欧盟 28 国移民劳动参与率与失业率 (单位:百分比)

国 家	劳动参与率			失业率		
	女性	男性	差值	女性	男性	差值
比利时	72.8	64.3	8.5	6.3	5.6	0.7
保加利亚	75.9	67.0	8.9	5.8	4.7	1.1
捷克	83.3	69.6	13.7	1.8	2.8	-1.0
丹麦	81.1	75.3	5.8	5.1	5.4	-0.3
德国	82.9	74.3	8.6	3.9	3.0	0.9
爱沙尼亚	82.6	75.6	7.0	5.4	5.5	-0.1
爱尔兰	78.8	67.1	11.7	6.0	5.8	0.2
希腊	76.6	59.9	16.7	15.5	24.4	-8.9
西班牙	78.8	68.6	10.2	13.8	17.1	-3.3
法国	75.7	68.1	7.6	9.1	9.1	0.0
克罗地亚	70.9	61.7	9.2	7.8	9.5	-1.7
意大利	75.1	56.2	18.9	10.0	11.9	-1.9
塞浦路斯	79.9	70.4	9.5	8.3	8.8	-0.5
拉脱维亚	80.5	75.1	5.4	8.5	6.6	1.9
立陶宛	78.9	75.8	3.1	7.1	5.6	1.5
卢森堡	74.7	67.4	7.3	5.4	5.9	-0.5
匈牙利	79.1	64.9	14.2	3.5	4.0	-0.5
马耳他	84.8	63.8	21.0	3.9	3.5	0.4
荷兰	84.7	75.8	8.9	3.7	4.0	-0.3
奥地利	81.6	72.0	9.6	5.1	4.7	0.4
波兰	77.0	63.3	13.7	3.9	3.9	0.0
葡萄牙	78.1	72.4	5.7	6.9	7.6	-0.7
罗马尼亚	76.9	58.3	18.6	4.8	3.6	1.2
斯洛文尼亚	78.2	71.7	6.5	4.7	5.8	-1.1
斯洛伐克	78.7	65.9	12.8	6.2	7.1	-0.9
芬兰	79.5	76.3	3.2	7.6	7.4	0.2
瑞典	84.4	81.0	3.4	6.7	6.3	0.4
英国	82.6	73.2	9.4	4.2	4.0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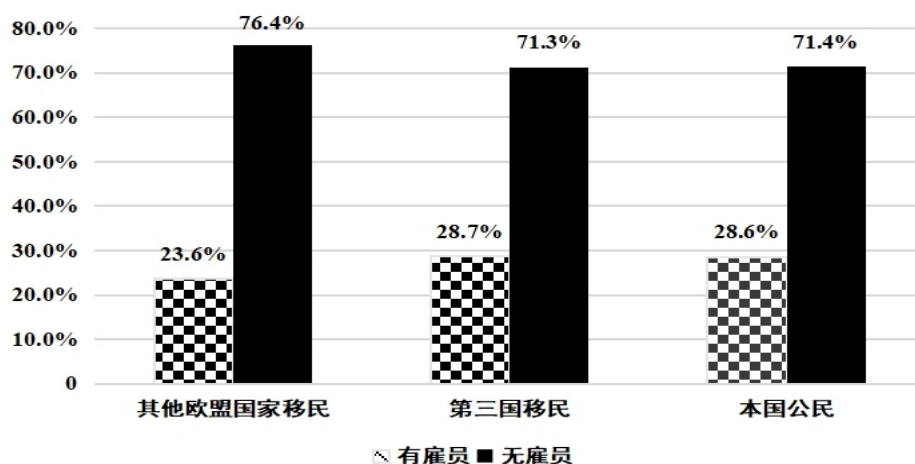
第三,外国移民自我雇佣比例自 2016 年起开始全面回落,且自主创业的规模较小。

自我雇佣是稳定和扩大就业、提升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对于缓解贫困、减少失业、缩小贫富差距、创新精神培育以及社会财富增长等都有积极的作用。由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我雇佣行为历来受到政府的重视,因此,自我雇佣比例也成为衡量外国移民经济融合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从2010年到2015年,第三国外国移民中自我雇佣者占就业者的比例增加了2个百分点,达到12.2%,2016—2018年由于欧洲难民危机和经济发展疲软又重新下降至11.0%。而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自我雇佣比例自2013便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2018年降为12.4%。在可获得数据的欧盟成员国中,第三国外国移民自雇比例最高的国家是捷克和英国(分别为34.0%和15.2%),其第三国外国移民的自雇比例均高于本国国民。而在希腊和意大利则完全相反,两国的本国公民自雇率明显高于第三国外国移民。希腊的本国公民自雇率为30.2%,而第三国外国移民自雇率仅有9.4%,相差20.8个百分点;意大利的本国公民自雇率为21.6%,第三国外国移民自雇率为13.1%,相差8.5个百分点。^①

与此同时,如图2所示,外国移民的自我雇佣行为大多数是自营,且没有雇员,在第三国外国移民中,有雇员的比例仅占28.7%,由此可见大多数外国移民自主创业的规模很小。因此,充分发挥自雇行为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积极作用,是促进自营职业向雇主过渡的更好方法。

图2 2018年28个欧盟成员国移民的自营职业比例(15—64岁)^② (单位:百分比)



第四,外国移民从事临时工作的比例高于本国人口,年轻外国移民从事临时工作和兼职工作的比例较高,女性外国移民从事兼职工作的比例远高于男性外国移民。

兼职和临时工作不利于劳动者权益的实现,因此,可以将兼职与临时工在就业中的高比例视为外国移民社会融合不足的具体体现。2018年欧盟28国外国移民临时与兼职工作比例可见表3。

在临时工作上,2018年28个欧盟成员国中,来自第三国外国移民中的15—64岁劳动者从事临时工作的比例为25.8%,高于本国同龄劳动者12.3%的比例。其中来自第三国外国移民中的15—64岁移民从事临时工作的比例与本国公民差异最大的是塞浦路斯,第三国外国移民身份的雇员中有60.3%是临时工,而本国公民仅有9.8%。其次是瑞典和比利时,分别相差32.2个百分点和21.5个百分点。奥地利与英国第三国外国移民与本国公民之间临时雇员所占的比例差异较小,分别相差1.6个百分点和4.4个百分点。在所有的欧盟成员国中,第三国外国移民作为临时雇员的的比例均高于本国国民。^③

在兼职工作方面,欧盟国家的整体数据显示,无论是其他欧盟国家移民还是第三国外国移民,

① 欧盟统计局: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lfsa_esgan/default/table?lang=en,检索时间:2020-10。

② 欧盟统计局: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lfsa_etpgan/default/table?lang=en,检索时间:2020-10。

③ E. Congregado, M. Carmona, A. A. Golpe, “Self-employment and Job Creation in the EU-12”, *Revista de Economía Mundial*, vol. 32, no. 30, 2012, pp. 133-155.

15—64 岁的外国移民兼职就业的比例均高于本国公民,其兼职就业的比例分别为 21.6% 和 25.9%。但在某些欧盟成员国中却呈现出结构性的国别差异,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本国公民的兼职就业率高于外国移民,分别高 5.2 个百分点、4.4 个百分点、2.8 个百分点。就性别而言,2018 年,第三国外国女性移民中有 25.1% 是临时工,略低于男性外国移民;而对于其他欧盟国家移民与本国公民来说,女性临时就业和兼职工作比例均高于男性。^①

此外,在就业人口中,外国移民年轻人口(15—29 岁)在临时就业中的比例过高,这在第三国外国移民中更为明显。2018 年外国移民中的青年的临时就业率为 31.9%,其中来自其他欧盟成员国的青年劳动者的临时就业率相对稳定。而第三国外国移民青年劳动者临时就业率从 2013 年开始便呈现出急剧增长的趋势,从 2013 年的 31.5% 上升到 2018 年的 38.5%。

表 3 2018 年欧盟 28 国移民临时与兼职工作比例^② (单位:百分比)

国 家	临时雇员			兼职		
	其他欧盟成员国移民	第三国移民	本国公民	其他欧盟成员国移民	第三国移民	本国公民
28 个欧盟成员国	16.2	25.8	13.5	21.6	25.9	18.7
比利时	13.3	31.4	9.9	21.1	25.7	24.8
捷克	13.5	14	8.3	3.3	8.5	6.3
丹麦	13.0	16.1	10.4	22.3	29	23.8
德国	16.8	23.4	11.6	24.6	31.7	26.6
爱尔兰	6.5	15.4	10.2	15.5	21.8	20
希腊	27.6	23.3	10.4	17.2	17.7	8.6
西班牙	34.2	45.2	25.1	17.4	21.6	13.8
法国	18.7	30.7	16	22.7	25.8	17.5
意大利	22	22.3	16.4	23.1	26.1	17.5
塞浦路斯	10.2	60.3	9.8	13.7	10.5	10.5
卢森堡	10.1	23.6	8.1	14.7	16.2	21.4
马耳他	9.6	19.1	6.3	16.1	9	13.4
荷兰	26.9	38.7	20.7	37	47.8	50.6
奥地利	9.4	10.5	8.9	27.7	26.6	27.3
斯洛文尼亚	16.3	24.5	15.3	9.5	8.9	9.8
芬兰	14.1	26.1	16	14.5	22.3	15
瑞典	19.6	46.6	14.4	23.2	28.1	22.4
英国	8.2	9.5	5.1	18.8	24.2	25.1

(二) 外国移民在收入领域的社会融合状况及分析

收入状况是衡量外国移民经济融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平均收入容易受到极端值的影

① 欧盟统计局: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lfsa_egaftsm/default/table?lang=en,检索时间:2020-10。

② 仅列出 28 个欧盟成员国中有可靠数据的 15—64 岁劳动年龄移民从事临时工作与兼职工作的比例。

响,中位收入可以反映收入处于中间水平的代表值,不受极端值的影响,二者具有互补的作用,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欧盟外国移民的真实收入水平,进而衡量其社会融合的状况。

第一,从收入变化的总体趋势来看,外国移民收入水平增速快于本国公民,但第三国外国移民的收入水平仍显著低于其他欧盟国家移民与本国公民。

自 2010 年以来,欧盟成员国本国公民与外国移民的收入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如表 4 所示,2018 年本国公民的平均收入与 2010 年相比上升了 14.4%,第三国外国移民的平均收入与 2010 年相比上升了 17.6%,其他欧盟成员国移民的平均收入与 2010 年相比上升了 27.0%,总体来看,外国移民的平均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本国公民。从平均收入来看,尽管欧盟成员国移民的平均收入普遍高于本国国民,但第三国外国移民的平均收入却要低很多,中位收入也呈现出相同的特点。如表 4 所示,2018 年,本国国民收入的平均数(20112 欧元)比第三国外国移民(15397 欧元)高 4715 欧元,本国公民收入的中位数(17705 欧元)比第三国外国移民(13315 欧元)高 4390 欧元。对比外国移民与本国国民的平均收入与中位收入的差距可以发现,中位收入的差距普遍大于平均收入,说明在第三国外国移民的收入远低于本国国民的收入。

表 4 2010—2018 年欧盟 28 国不同公民身份收入水平 (单位:欧元)

年份/公民身份	平均收入			中位收入		
	其他欧盟国家移民	第三国移民	本国公民	其他欧盟国家移民	第三国移民	本国公民
2010	18552	13098	17585	15828	11277	15318
2011	19187	13503	17703	16060	11530	15384
2012	20276	15112	18127	17064	12688	15889
2013	20079	13968	18159	17527	12249	15863
2014	20634	14741	18540	17558	12525	16218
2015	20973	15394	18976	18090	13043	16565
2016	21715	14680	19332	18530	13169	16947
2017	22290	14326	19239	18616	12395	16934
2018	23554	15397	20112	19226	13315	17705

第二,人口收入水平的国别差异较大,收入水平高的国家本国公民与外国移民的收入差距也大,而收入差距小的国家往往收入水平普遍较低。

从欧盟成员国的角度来看,如表 5 所示,2018 年本国公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是卢森堡(53694 欧元),其次是丹麦(34028 欧元)、爱尔兰(29833 欧元),第三国外国移民平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依然是卢森堡(39687 欧元)、爱尔兰(28311 欧元)和丹麦(26500 欧元),第三国外国移民平均收入水平最低的国家是保加利亚(4177 欧元)、克罗地亚(5471 欧元)和匈牙利(5613 欧元)。其中,第三国外国移民平均收入与本国公民相比差距最大的国家是卢森堡(14007 欧元)、瑞典(11984 欧元)和奥地利(10018 欧元),收入差距最小的是捷克(第三国外国移民平均收入比本国公民高 52 欧元)、保加利亚(第三国外国移民平均收入比本国公民低 529 欧元)和匈牙利(第三国外国移民平均收入比本国公民低 659 欧元)。英国、捷克、波兰的第三国外国移民平均收入要高于本国公民,这与外国移民的文化构成与人才政策有关,因为迁入这三个国家的外国移民大多受教育程度较高,由此获得的工作岗位的收入较高。

2018 年欧盟本国公民中位收入最高的是卢森堡(46794 欧元)、丹麦(30323 欧元)和奥地利(27222 欧元),第三国外国移民中位收入最高的国家卢森堡(28345 欧元)、丹麦(23036 欧元)、爱尔兰(21232 欧元)。中位收入最低的国家是保加利亚(3709 欧元)、克罗地亚(4307 欧元)和匈牙利(4692 欧元),与平均收入水平相一致。其中,第三国外国移民平均收入与本国公民相比差距最大的国家是卢森堡(18449 欧元)、瑞典(12178 欧元)和比利时(10046 欧元),收入差距最小的是保加利亚(第三国外国移民平均收入比本国公民高 60 欧元)、捷克(第三国外国移民平均收入比本国公民高 117 欧元)和匈牙利(第三国外国移民平均收入比本国公民低 838 欧元)。保加利亚、捷克、波兰的第三国外国移民中位收入要高于本国公民。这也与外国移民的文化构成与上述国家的技术人才移民政策紧密相关。

表 5 2018 年欧盟 28 国不同公民身份收入水平^① (单位:欧元)

国家/公民身份	平均收入			中位收入		
	其他欧盟国家移民	第三国移民	本国公民	其他欧盟国家移民	第三国移民	本国公民
欧盟 28 国	23554	15397	20112	19226	13315	17705
比利时	25230	16060	25945	20953	14326	24372
保加利亚	\	4177	4706	\	3709	3649
捷克	12349	10183	10131	11065	9188	9071
丹麦	35616	26500	34028	26493	23036	30323
德国	29888	21851	25785	22283	18488	22964
爱沙尼亚	11781	9486	11954	10871	8079	10742
爱尔兰	26963	28311	29833	24433	21232	25859
希腊	8972	6127	9381	7267	5416	8207
西班牙	12920	10307	17674	9774	8826	15459
法国	24636	16982	26666	19050	15164	23059
克罗地亚	9692	5471	7414	8080	4307	6748
意大利	13904	12243	20307	12393	11438	17867
塞浦路斯	15600	15018	18355	13181	11000	16094
拉脱维亚	14532	6975	8940	8887	6024	7481
立陶宛	\	7210	8468	\	5109	6942
卢森堡	43548	39687	53694	35522	28345	46794
匈牙利	8625	5613	6272	5182	4692	5530
马耳他	19477	13669	16904	16070	11761	14970
荷兰	25169	19437	27107	22991	16236	24104
奥地利	26466	19621	29639	21585	18868	27222

(见下页续表)

^① 注: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的数据缺失,波兰、立陶宛、保加利亚的欧盟国家移民数据收入水平缺失。

(接上页)

波兰	\	9062	7319	\	7518	6557
葡萄牙	14409	9796	11190	10000	8265	9413
斯洛文尼亚	12984	10027	14300	12191	9438	13378
芬兰	26558	21014	27850	25382	17622	24805
瑞典	25093	17169	29153	23649	14620	26798
英国	26776	26491	25818	22629	19947	21924

第三,外国移民的贫困风险率普遍高于本国公民,第三国外国移民的贫困风险率远高于其他欧盟国家移民与本国公民。

贫困风险率是指处于贫困或社会排斥风险中(At Risk of Poverty or Social Exclusion),生活在严重物质匮乏或工作强度很低的家庭中的比例,简称 AROPE。这一比例是欧盟监测贫困状况以及社会包容状况的主要指标。贫困风险率的具体标准设定,相当于社会再分配后全国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60%。

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外国移民的贫困风险率普遍高于本国公民。本国公民的贫困风险率始终稳定于 20%—23% 之间,而来自第三国的外国移民通常处于较高的贫困风险率中,2017 年第三国外国移民的贫困风险率高达 50.1%,2018 年降至 44.9%。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移民贫困风险率处于 27%—30% 之间,2018 年贫困风险率为 27.4%,降至 2010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国别来看,2018 年第三国外国移民的贫困风险率最高的国家是瑞典,高达 57.9%,其次是希腊(57.1%)和西班牙(56.4%);第三国外国移民贫困风险率最低的国家是波兰(16.7%)、捷克(19.9%)和德国(26.3%)。出现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波兰和捷克等东欧国家素来不愿接纳外国移民,尤其是难民,因此,入境波兰和捷克的第三国外国移民多是备受欢迎的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而德国近年来的移民政策也多是选择性移民,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成为首选,即使接纳了难民,也是优先选择受过良好教育的难民。^①

(三) 外国移民在住房领域的社会融合状况及分析

住房既是个人福祉的基本元素,也是衡量社会成员或外来移民是否进入主流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对每个人的生活空间的类型、质量和成本进行评估对于衡量其生活水平和社会包容以及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至关重要。

第一,外国移民生活在租住房屋中的比例远高于本国公民,且居住质量较低,有 26% 的第三国外国移民生活在过度拥挤的房屋中。

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 年,欧盟国家年龄在 18—64 岁之间的国民中,有 70.5% 的公民居住在自有住房中,是房屋的所有者,而同一年龄段的所有外国移民中这一比例仅有 31.0%,也就是说有 69% 的外国移民是租户。2018 年,在 28 个欧盟成员国中,外国移民是租户的比例最高的国家是意大利(83.9%),其次是斯洛文尼亚(80.8%)和奥地利(78.4%)。在欧盟成员国中,拥有住房的外国移民比例最高的是爱沙尼亚(83.7%),拉脱维亚(81.7%)和匈牙利(77.2%)。^②

过度拥挤率是指生活在过度拥挤的家庭中的人口百分比。按照欧盟的标准,非过度拥挤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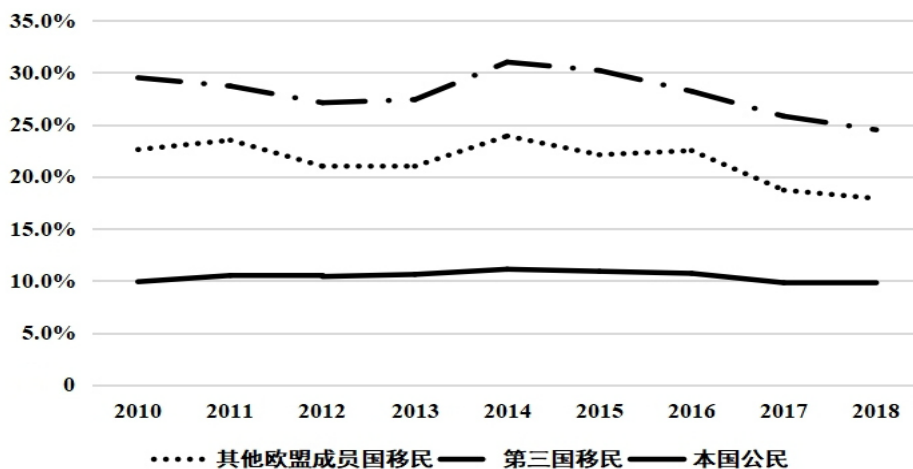
^① 欧盟统计局: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ilc_li31/default/table?lang=en,检索时间 2020-10。

^② 欧盟统计局: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ilc_lvho15/default/table?lang=en,检索日期:2020-10。

庭有五条标准:有一间供家庭使用的房间;家庭中每对夫妇拥有一个房间;每位18岁及以上的孩子拥有一间单人房;每对12—17岁的相同性别的孩子共有单人房间;每对12岁以下的儿童共有一个人房间。若不能满足以上标准,则视为过度拥挤的家庭。过度拥挤率通常与其他社会包容指标、社会融合指标紧密相关。由于外国移民受到语言适应、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等因素的消极影响,因此,外国移民比本国公民更有可能居住在过度拥挤的家庭中。2018年,在欧盟,年龄在18—64岁之间的外国出生的外国移民的过度拥挤率为22.1%,而本地出生人口过度拥挤率为15.2%。在外国出生的外国移民中,第三国外国移民的过度拥挤率(26.0%)比在欧盟成员国之一出生的外国移民(14.5%)高11.5个百分点。从国别的角度看,保加利亚(60.0%)、波兰(53.3%)和希腊(52.4%)的外国出生的外国移民的过度拥挤率最高。而马耳他(3.3%)、塞浦路斯(4.7%)、爱尔兰(7.2%)的外国出生外国移民的过度拥挤率低于10%,是外国出生的外国移民过度拥挤率最低的国家。

第二,住房开支是外国移民生活中的一项重大开支,欧盟成员国移民与第三国外国移民的住房成本超支率均高于本国公民。

图3 2010—2018年不同公民身份的人口的住房成本超支率(15—64岁)^① (单位:百分比/年)



住房成本超支率是指居住所需费用占家庭可支配收入40%以上的家庭中的比例。如图3所示,本国公民的住房成本超支率明显低于外国移民,且比较稳定,第三国外国移民的住房成本超支率始终位于最高水平。2010年到2013年,本国公民与第三国外国移民之间的住房成本超支率的差距在不断下降,从19.6%降至16.8%。但从2013年至2014年,第三国外国移民的住房成本超支率大大增加,远超过本国公民,差距扩大到19.9个百分点。在2015年第三国外国移民的住房成本超支率与本国公民差距略有缩小,为17.5个百分点,2016年至2017年两年中差距减小的速度加快,2018年达到2010年以来差距的最小值(14.8个百分点)。

(四) 外国移民在教育领域的社会融入状况及分析

受教育程度既可视作影响外国移民社会融合结果的重要因素,也可以视为外国移民社会融合的成效。尽管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无法判断外国移民的教育是在哪里完成的。但外国移民受教育程度越高、与本国公民的受教育程度的差距越小,外国移民在教育方面的社会融入就越好。

第一,第三国外国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欧盟成员国移民,就国别而言,迁入英国、波兰、爱尔兰的外国移民受教育程度较高。

^① 欧盟统计局: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ilc_lvho25/default/table?lang=en,检索时间:2020-10。

考虑到受教育进程因素的限制,对受教育程度的分析主要基于欧盟统计局 25—54 岁的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18 年,在第三国外国移民中,仅接受过初等教育(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比例最高(34.9%),这一比例比在本国公民中仅接受初等教育的比例高 17.5 个百分点,比其他欧盟成员国外国移民高 13.5 个百分点;在高中、中专等非高等教育水平上,接受过此等教育的外国移民占第三国外国移民的 36.5%,比本国公民低 10.5 个百分点;在高等教育方面,其他欧盟国家的外国移民所占比例最高,有 37.0% 的欧盟国家的移民接受过高等教育,比本国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 1.4 个百分点,比第三国外国移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 5.8 个百分点。^① 如果将本国公民与外国移民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就国别而言,意大利(48.7%)、西班牙(39.7%)、希腊(39.1%)的受教育程度低的外国出生人口比例最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外国出生人口和本地出生人口所占比例之间的差距最大的国家是德国(22.9%)、瑞典(22.4%)、法国(20.9%)、希腊(20.4%)和芬兰(17.8%)。意大利和希腊由于地缘关系、德国由于积极的欢迎难民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上述三国接纳了大量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难民,这是其外国移民受教育水平降低的主要原因。

欧洲教育与培训合作战略框架和“欧洲 2020 年战略”的目标是“确保到 2020 年 30—34 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至少达到 40%”,外国移民将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欧盟成员国中外国移民占较大比例。比利时、丹麦、爱沙尼亚、爱尔兰、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波兰、瑞典和英国 11 个国家已经达到了这一指标。而捷克、丹麦、爱沙尼亚、爱尔兰、拉脱维亚、卢森堡、匈牙利、马耳他、波兰、葡萄牙、英国 11 个国家,第三国移民在接受高等教育的 30—34 岁年龄段中所占的比例甚至高于本地出生的同龄人。本国公民与外国移民受高等教育比例差距最大的国家是希腊,受过高等教育的本国公民比外国移民多 33 个百分点。受过高等教育的外国出生的外国移民比例最低的是意大利(14.0%)、希腊(15.1%)、斯洛文尼亚(22.1%)。

第二,接受教育和培训的主体是外国移民中的 18—24 岁年轻人,在培训过程中个人中断培训的年轻外国移民的比例显著下降。

2018 年,在 28 个欧盟成员国中,18—64 岁的外国移民在调查前的四个星期中接受过教育或培训(正式或非正式)的人数百分比为 15.1%,18—24 岁的年轻外国移民正在接受教育或培训的比例为 53.3%,与 2017 年相比基本保持不变。就国别而言,2018 年芬兰(34.9%)、瑞典(34.6%)和丹麦(27.7%)的外国移民中正在接受教育或培训的比例是最高的。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立陶宛、拉脱维亚、希腊和克罗地亚的外国移民正在接受教育或培训的劳动者比例均低于 10%,其中克罗地亚仅有 3.3%。在欧盟 28 个国家的总体数据中,接受培训的外国移民中受教育水平为初等教育且未完成进一步教育或培训的年龄为 18—24 岁的人的比例是明显下降的,从 2010 年的 25.6% 降至 2018 年的 20.1%。^②

(五) 外国移民在积极公民身份领域的社会融合状况及分析

第一,2018 年欧盟成员国的移民入籍归化率为 2.18%,达到了近 10 年的最低值,其中瑞典和罗马尼亚的入籍归化率最高。

获得国籍是东道国有效实现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入的基本途径,因为国籍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积极的公民权。2018 年获得欧盟 28 个成员国公民身份的外国移民人数为 67.23 万人,与 2017 年相比减少了 4%。其中,获得欧盟成员国公民身份的第三国移民有 56.61 万人,占 84%。这些新欧盟国家的公民主要来自非洲(28%)、欧盟以外的欧洲(25%)、亚洲(16%)以及北美和南美洲

^① 欧盟统计局: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edat_lfs_9911/default/table?lang=en,检索时间:2020-10。

^② 欧盟统计局: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trng_lfs_12/default/table?lang=en,检索时间:2020-10。

(14%)。欧盟成员国获得另一个欧盟成员国公民身份的公民总数为 8.96 万人,占总数的 13%。欧盟的最大新公民群体是来自摩洛哥的移民(6.72 万人),其次是阿尔巴尼亚移民(4.74 万人)、土耳其移民(2.84 万人)和巴西移民(2.31 万人)。大多数摩洛哥移民获得的是西班牙(38%)、意大利(23%)或法国(23%)的公民身份,而大多数阿尔巴尼亚移民获得希腊公民身份(51%)或意大利公民身份(46%),大多数土耳其移民获得德国公民身份(59%),约一半巴西移民获得意大利公民身份(46%)。^①由此可见,国籍的获得与殖民地的历史传统、招募外国人政策以及已存在的移民网络链紧密相关。从国别来看,外国移民在德国获得公民身份的人数最多,为 11.7 万人(占欧盟总数的 17%),其次是意大利(11.3 万人)、法国(11.0 万人)、西班牙(9.1 万人)和瑞典(6.4 万人)。从获得公民身份的绝对数量来看,与 2017 年相比,意大利的下降幅度最大,获得意大利公民身份的外国移民减少了 3.41 万人,其次是希腊(-6400 人)、瑞典(-5100 人)、丹麦(-4400 人)和法国(-4300 人)。就相对规模而言,一个常用的指标是“入籍归化率”,是指在同一年年初授予的公民总数与非国民居民(外国移民)的总人数之间的比率。欧盟外国移民的入籍归化率在 2018 年为 2.18%,达到了近 10 年的最低值。2018 年入籍归化率最高的国家是瑞典(7.2%),其次是罗马尼亚(5.6%)和葡萄牙(5.1%)。而斯洛文尼亚、奥地利、拉脱维亚、丹麦、立陶宛、捷克、爱沙尼亚的入籍归化率均不足 1%。

第二,就居留许可的类型而言,外国移民在欧盟国家所获长期居留许可占最大比例,波兰除外。

2018 年 12 月,欧盟成员国向非欧盟的第三国外国移民发放了 2120 万张有效居留证,其中家庭团聚类居留许可占欧盟第三国外国移民有效居留许可的近 40%。摩洛哥移民和土耳其移民(均为 190 万)是 2018 年年底在欧盟持有效居留证的两大群体,其次是中国和乌克兰移民(均为 120 万)。长期居留许可的有效期均为 12 个月或更长时间。长期居留许可意味着可以为非欧盟的外国移民提供更安全、更便捷的居留身份,进而可以让外国移民拥有与国民更相似的社会经济权利和责任(积极公民权利)。2018 年,欧盟向第三国外国移民发放的有效居留证中有 93.8% 有效期为 12 个月或更长时间,而有效期为 6—11 个月的仅为 5.0%,有效期为 3—5 个月的为 1.2%。只有波兰颁发给外国移民居留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6—11 个月的比例最高(58.0%),而有效期为 12 个月或更长时间的居留许可仅占 39.8%。^②

四、结论与前景

通过对欧盟统计局相关数据和社会融合的多维度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尽管存在欧盟成员国的国别差异,但已经凸显了欧盟的“欧洲 2020 年战略”和《第三国国民融合行动计划》实施的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合的显著效果。

就欧盟的外国移民的总体特征而言,在移民规模上,2018 年迁入欧盟国家的外国移民人数呈现回升趋势。2018 年,共有 454.6 万外国移民进入欧盟国家,只有 295.6 万外国移民离开了欧盟国家。居住在欧盟国家的第三国外国移民数量为 218.6 万,占迁入总人数的 48.1%。从外国移民的绝对数量来看,迁入外国移民总数前五位的欧盟国家是德国、西班牙、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五个成员国中的外国移民总数占居住在所有欧盟成员国中的外国移民总数的 62.9%。从外国移民的迁移率来看,人口流动性最大的是马耳他、卢森堡和塞浦路斯。

就欧盟的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合而言,外国移民在就业、收入、住房、受教育程度和积极公民身份

^① 欧盟统计局: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migr_acqs/default/table?lang=en,检索时间:2020-10。

^② 欧盟统计局: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migr_resshare/default/table?lang=en,检索时间:2020-10。

等五个领域,都有显著的进步。从就业情况来看,外国移民的劳动参与率整体上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尽管欧盟第三国外国移民的失业率高出本国公民,但其差距却呈现出缩小的趋势。从收入变化的总体趋势来看,外国移民收入水平增速快于欧盟国家的本国人口。从住房情况来看,外国移民生活在租住房屋中的比例大大高于本国公民,但与以前相比,也有显著改善,仅有26%的第三国外国移民生活在过度拥挤的房屋中。从受教育程度来看,第三国外国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尽管明显低于欧盟成员国移民和欧盟国家国民,但在某些欧盟成员国,外国移民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在第三国外国移民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最低的国家也有近三分之一。接受教育和培训的18—24岁的外国移民的年轻人因个人原因中断培训的比例明显下降。从积极公民身份来看,2018年欧盟成员国的入籍归化率达到了近10年的最低值。但居住在欧盟国家的第三国外国移民持有的居留签证有93.8%是长期签证。这有利于外国移民在欧盟国家更好、更有效的社会融合。

从近期发展前景来看,伴随着2016年以来难民危机诱发的欧洲地区民粹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①、排外主义抬头^②、欧洲政治的碎片化^③,直接导致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移民政治和移民政策的右倾化,由此,接纳外国移民,尤其是难民的规模日渐缩小,移民政策逐渐收紧,而更加重视社会融合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在接纳更多外国移民还是实现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上,欧盟已经实现了从大规模的接纳外国移民到促进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合的根本性转变。2022年2月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以来,超过534.93万乌克兰难民进入欧盟,其中480万获得难民身份或得到保护^④,由于乌克兰难民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且在宗教、文化价值观和种族等因素上,与欧盟国家具有极高的契合性,因此,可以预料,尽管存在着诸多困难,但伴随着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系列针对外国移民社会融合政策的有效实施,包括乌克兰难民在内的第三国外国移民在欧盟的社会融合程度逐步提高的趋势近期不会改变。一个多民族、多元化的欧盟正显现出生机勃勃的强大活力。

Abstract Whether the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can bring into play the positive role of foreign immigrant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key factor is whether foreign immigrants can be success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mainstream society of EU countries. Foreign immigrants in the EU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social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employment, income, housing, education and active citizenship.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of foreign immigrants shows a slow growth trend on the whole; their income level rises faster than that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foreign immigrants in rented housing hav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e education attainment of third country immigrants has progressed remarkably; and the long-term residence visas of more than 10 years for foreign immigrants have accounted for 93.8 percent of all foreign visas. This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t results achieved with the social integration policy of foreign immigrants under the EU's "Europe 2020 Strategy" and the "Action Plan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ird Country Nationals".

(宋全成,教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甘月童,副研究员,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济南,250100)

[责任编辑:邓颖洁]

① 郑春荣:《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影响》,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② 刘泓:《新冠感染疫情下西方排外主义的发展态势与走向——基于国外文本讨论的海外华人问题评析》,载《烟台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

③ 郑春荣:《欧洲政治碎片化与中欧关系走向》,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6期。

④ 联合国难民署:<https://www.unhcr.org/ukraine-emergency.html>. jms0. 检索日期:2023-02。